

社会学实证调查的衍变及其启示

——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调查范本*

马惠娣 刘 耳

[摘要] 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科学概念的提出始自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工业社会诞生以来,有关生活、生活方式、生活与时代关系等问题成为社会学关注的焦点,由此衍变出众多的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首次提出了生活方式的概念,而且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对生活方式的实证调查,包括设计了首个生活状况问卷调查。通过考察他们实证调查的详细内容及其意义,可以梳理生活方式与生活方式问卷调查在中国的衍变,从中获得启迪,进而对当代中国社会学调查中某些现象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 实证调查;生活方式研究;《工人调查表》;中国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4)10-0059-08

一、实证调查的经典范本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首次提出了生活方式的概念,而且他们先后设计了世界上最早的生活状况的实证调查。

(一)恩格斯的实证调查

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恩格斯用半年的时间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展开调查,并于1845年5月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本书出版时在封面上特别标注了“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在德文版第一版的“序言”中,恩格斯写道:“我有机会在二十一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1](p.278)]在“大城市”一章中,恩格斯描述了“普通的工人住宅”和“生活环境”:“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

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像的。”^[1](p.307)]

他还引述了一位牧师对自己的教区的描述:“这里有1400幢房子,里面住着2795个家庭,共约12000人。安插了这么多人口的空间,总共只有不到400码(1200英尺)见方的一片地方,由于这样拥挤,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10—12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全区在十个当家人当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外还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秸或刨花的麻袋。”^[1](p.309)]

对一个叫做“索尔福城”的工人区,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描述:“整个城市都是由大杂院和狭窄的小胡同所组成的……在这个地方,我遇到一个人,看样子已经六十来岁,住在一个牛

* 本文系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10@zh020]的研究成果。

作者:马惠娣,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耳,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教授。

棚里;在这个没有窗子、没有地板、甚至地上什么也没有铺砌的方匣子里,他装了一个像烟筒似的东西,放了一张床,就住在里面,一下雨,雨水就从破烂的屋顶往下漏个不停。这个人已经太老,太衰弱,不能做经常性的工作了;他用手推车搬运粪便等等来维持生活;粪坑就紧靠着他住的牛棚。”^{[1](pp.344-345)}

而生活环境之恶劣,恩格斯也有详细的记录:在“各别的劳动部门”一节中,有这样的记述:“工厂里的空气通常都是又潮又暖,而且多半是过分地暖;只要通风的情形不很好,空气就很恶劣,令人窒息,没有足够的氧气,充满尘埃和机器没蒸发的臭气;而机器油几乎总是弄得满地都是,并且还渗到地里。”^{[1](p.442)}

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给其家庭带来很多灾难:“首先是女人出外工作完全破坏了家庭。如果妻子一天在工厂里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而丈夫又在同一个地方或别的地方工作同样长的时间,那末他们的孩子的命运会怎样呢?他们像野草一样完全没有照管地生长起来;或者每星期花1个或1½先令把他们托付给旁人照管,而那些人会怎样对待他们,那是不难想像的。所以在工厂区,小孩子因缺乏照顾而酿成的不幸事件就惊人地增加起来。根据曼彻斯特的验尸官的记录,在九个月内有69个孩子烧死、烫死,56个淹死,23个摔死,77个因其他不幸事件致死,就是说,一共发生了225起不幸事件。”^{[1](p.429)}

恩格斯在长达近1年的时间里,通过观察、体验、调查、材料的搜集,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写作。这个调查帮助恩格斯掀开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作中悲惨境况的面纱,阐明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地位、斗争历程和历史使命,对于提高阶级觉悟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高度评价这本书,认为这是几乎完全符合他的思想的唯一的一部书,“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2](p.10)}至今是社会运动和社会学的一面旗帜,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题词中写道:“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

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1](p.273)}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出版后,很快引起了法国、德国、美国思想界与媒体的高度关注。当该书即将在美国出版的时候,恩格斯写了“美国版附录”,他写道:“用讲英语的读者的本族语言呈献给他们的这本书,是四十多年以前写的。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书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劳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将在最近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德国、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3](pp.292,297,298)}

从上述这些文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年轻时代的恩格斯的远见卓识,也看到一位伟大导师对自己工作的真诚的反思。

(二)马克思的问卷调查

1880年,马克思的身体并不好,正如恩格斯所说:他的病在1864年和1865年就显露出严重的症状了。^{[4](p.1X)}1880年前后,马克思曾不得不多次去治病和疗养。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工作,而是继续完成《资本论》各卷的写作。《工人调查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撰写的,可见他对

工人阶级状况的关心和对社会调查的重视。《工人调查表》设计了4大类近100个问题,其中研究劳动条件的占45%,研究工人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的占35%,研究工人组织和合作组织的占20%。^①这些问题为全面了解城乡男女工人的生活经济条件、身体条件、智力条件和道德条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这个调查表指导思想明确、设计结构缜密、各种要件具备。这项调查如能顺利实施,获取的资料将能为他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提供更多的实证支持。

马克思指出,干活付工资,看似公平合理。但实际上,“等价交换”的原则却没有体现出来。他通过调查注意到:工人为资本家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自己所得的报酬,比如一个工人一天劳动所得为8元钱,而他在一天之内为资本家所创造的利润远远不止8元,可能是16元,也可能是24元,还可能更高。那么这多余的部分,即这个工人工资之外的8元或16元或更高的数额,就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地剥削了。马克思把这个“账”算清以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手段、诀窍就给暴露出来了,这使广大工人阶级更认清了资本家的剥削方法,从而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待遇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在法国工人中发放了25000份,但基本没有回收填答好的问卷。^②由于没有回收问卷,这项调查就没有产生预期的研究成果,因而基本上没引起人们的重视。在问卷调查技术已很成熟的今天,我们不难分析出这次调查在设计上存在的若干问题,如问卷过长,且都是开放式问题,会使被调查者完整填答负担过重(不过《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编辑部在发布这份问卷时为它写的前言有“不一定要回答全部问题”的说明),以及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促使收到问卷的工人进行填答等。但马克思晚年能以带病之身,花功夫认真设计这么多关于工人生活情形的问题,说明马

克思试图把自己的理论观点建立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科学精神。^③

马克思的工作也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1875年以后,他在伦敦的家成为了一所“向全世界开放的住宅”。“进进出出的,并不只是工人运动的代表们,著名的科学家和民主主义政治家都在这里受到诚挚的欢迎”。“马克思非常善于在个别交谈的过程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并说明理由……有不少来访者,原以为马克思是一个忧郁的对某一主义有狂热信仰的人,或是一个怪癖的科学家。但是一经交谈,就发现他不但能够讨论政治问题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而且还善于妙趣横生地谈论世界文学名著、伦敦演员的生活、自然科学方面主要的发现等等。”“对他来说,写作《资本论》已成为生活之必需,可是他的心里很明白,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冲突的关键时刻,他不能坐在大英博物馆里读书。”^[5](pp.322-330)]因此,他的叙述丝毫不带空想色彩。他指出,向共产主义发展要分两个阶段来进行。虽然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后,无产阶级将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但是这个阶级还没能力来满足所有居民的一切需要。因此,在这个阶段,应当按照各人贡献的大小来进行分配。只有在生产力增长越来越快,而且那种把劳动看作生活中头等需要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出现的时候,才具备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的先决条件。那时就将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6](pp.22-23)]

马克思并没有给共产主义定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也没有梦想一个未来的闲散乐园。他清晰地解释了将来决定共产主义时代经济和生活的一些原则。马克思对于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的发展趋势作了精密的科学分析。这些精密的分析,既得益于他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体察和大量的社会调查,也得益于他对各种材料的占有。“马克思研究科目之多和他使用过的材料之浩瀚,是同样惊人的。仅仅在俄国统计学方面,他所阅读

①参见马克思:《工人调查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436页。

②参见Rodney Stark, Sociology, 5th ed.,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Belmont, CA, 1994:26. Stark误以为问卷是对英国工人发放的,但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2-633页的注154,应该是在法国工人中发放的。

③在西方社会学领域,人们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年)一书中,就已能发现有某些研究工作所特有的实现步骤和提问方式,以解决自己提出的一些逻辑特性差异极大的问题,可以算初步有了进行实证调查的思路。但在生活方式方面设计详细的问卷试图进行大规模的调查,马克思无疑是第一人。

的书籍,恩格斯就能给他开列出一大堆,其体积超过二立方米。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把这些材料全部利用了。他研究了财政金融、农业史和农业方面的所有重要新现象。此外,他还阅读了地质、生理和数学方面的许多书籍。他读过的书,几乎都做了摘记,多半还附以批判性的边注和解释。”^{[5](pp.324-325)}

恩格斯曾这样说道:“马克思由于自己在理论上和时间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归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6](pp.22-23)}

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这样评价了马克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7](pp.574-575)}

恩格斯特别强调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认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是划时代的创新,它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结束了社会历史科学在黑暗中摸索的状态,为人们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给那些看起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现象以规律性的阐释,使人们豁然开朗。^{[7](p.574)}

马克思曾深受德国思辨哲学的影响,但是,后来他与恩格斯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7](pp.30-31)}由此可见,调查与观察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的实践经验论以及唯物史观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继孔德之后的社会学奠基者

之一。在西方社会学界有人把马克思誉为“真正的现代社会学之父”。^[8]

二、实证调查及生活方式研究 在中国的衍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计了世界上首个有关生活方式的问卷调查,提出了著名论断:“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稍后于他们的西方社会学家涂尔干(也译为杜尔凯姆)与韦伯提出的“先懂得我们的生活是如何被我们的社会环境所塑造,又要积极地选择不同的行动来让生活更加美好”,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生活理论的延续。^[9]

在中国,1840年以后,力图强国富民的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章太炎于1902年翻译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著的《社会学》;严复于1903年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译作题为《群学肄言》出版;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一是打破传统,提倡民主与科学;二是目光向下,关注平民生活,“到民间去”。中国的社会学者以“社会调查”的方式参与其中,并起到了极为独特而关键的作用。社会调查工作是立国之本,在中国知识界第一个批判传统治学方法、提倡实地社会调查的是陶孟和。^[10]这些事件通常被视为社会学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标志。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他撰写的《三民主义》成为当时变革社会、政治、经济、民生体系治国方略中的核心思想。在三民主义中,他特别重视民生主义,并为民生主义下了定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11](p.792)}他把民生主义解释为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全部土地都归国家所有,铁路、矿山、森林、航路都由国家经营,国家从土地和国营企业获得‘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收入,并用以举办免费教育、养老恤贫和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事业,供公民享用;公民人人权利平等,无尊卑贵贱之分。”^{[11](p.793)}

1919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西学东进”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将生活概念

引入中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时观北京市民的生活,并形容为“苦闷、干燥、污秽、迟滞、不方便、不经济、不卫生、没有趣味……我们急切地要求一种新生活。”于1919年在《新生活》第5期撰文,呼唤“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提出了“改良生活的样本”,“我把北京市民生活应该改良的地方,捡那重要的,一条一条的写在下面”。^[12]

当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这份“改良生活的样本”中,不难看出他对生活方式的关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相同。在这样一个革命者看来,所有革命,所有文化运动,最终的目的是让人的生活好起来,为此,他宁愿抛头颅洒热血,且视死如归。

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吴文藻在美国学习期间,所学课程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回国后,他不满于当时国内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盘西化的状况,在寻找理论架构、领导进行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培养中国独立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人才等方面积极推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①

中国社会学的另一位奠基者费孝通,所著《江村经济》是他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毕业时的博士论文,是他赴伦敦之前在江村所做调查报告的一个结晶,被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誉为社会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②被后学称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山之作。该书从中国农村的一个普通村庄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入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社区”一词为费孝通创译)的一般结构和变迁。^{[13](p.20)}在此之前,没有一个社会学者对中国农村做过这么深细的研究。

民国期间也出版了冯友兰、梁漱溟等哲学家对生活问题思考的著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于光远等发表多篇论文谈生活方式问题,于光远提出“抓生活、促生产”的概念,并在多个场合讲:“现代

人,应该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在现代人生活方式中,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要素。讲科学、讲道德、讲礼貌、讲美、讲卫生、将享受、讲发展和表现自己的才能与个性,等等,哪一点不属于文化要素?离开了这些文化要素,也就没有三中全会提出的与现代生产力发展和进步要求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增强生活中美的文化要素,一要增加和提高客体中美的要素;二要提高接受美的主体的审美情趣和能力。”^{[14](p.346)}尽管于光远在社会学理论方面没有完整的思想体系,也没有完整的社会调查作为范本留存于世,但是,他作为中国当代不多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他全面地吸收和继承了马克思的人文思想——笔者),并凭借他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发表了大量的论生活方式的文章,也组织了这个主题的许多学术会议,推动了这一学科在当时中国的发展。乃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其中三段文字论及“生活方式问题”,也许与他作为直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智囊人物有重要关系。“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15]

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玉波等人撰写的《生活方式》一书,阐明生活方式并不是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问题,它关系到社会发展的目标、内容、人的形成等问题。其中含有12个章:怎样理解生活方式、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家庭生活方式、妇女生活方式、青年生活方式、老年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城市生活方式、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1990年,全国妇联启动了“妇女社会地位

①参见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吴文藻传略》,载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附录,民族出版社1990版,第338-341页。

②参见马林诺夫斯基:《江村经济》序,载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页。

调查”,其中在调查中含有“生活方式”的章节,如今已进行了3次大型调查。而在第二、第三次调查中都突出了闲暇时间分配与利用问题。

1991年,王雅林、董鸿扬出版了《闲暇社会学》,以中国9个城市为调查目标,提出了针对闲暇时间利用与支配问题的系列数据指标。

1998年,我国组织“西方休闲研究译丛”5本书的译介,并于2000年正式出版发行,其中通过《走向自由:闲暇社会学新论》、《你生命中的休闲》、《女性休闲》等书,引入了许多新的休闲生活方式理念和调查方法。

2004年,马惠娣等人主编了《中国人休闲生活状况调查》,此后,这类调查日趋活跃。

自2010年以来,中国休闲研究中心、中国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连续多年以“闲暇时间与生活方式的品质”为论题展开讨论。在2012年的年会上,王雅林继续续写“生活方式的问题”,再次介绍了马克思把“生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对生活的本源性、本体性的阐述,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生活的生产”过程的思想等等。

2010年,费孝通的《文化与文化自觉》一书出版,他在研究“社会属性中发现了生活结构”,并认为,生活是解读社会的密码,也是重要的变量。他强调:“生活需要是社会得以运行的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因。”^{[16](p.113)}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期盼中华民族未来的生活得更美好。美好生活,实现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也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

三、经典社会调查范本带给我们的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生活方式设计的实证调查给我们留下了两个经典的范本。虽然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的研究设计非同一般人所为,也非一般人所能为,但他们的方法论至今仍带给我们许多启示。

第一,实证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

法,可以说百余年来人类生活、生活方式的进步与发展部分地得益于社会学提供的调查方法,得益于生活方式的研究。事实上,取得重大进展主要在定量研究方法上,尤其表现在观察计划和操作程序两个方面。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活方式领域开创性的实证研究之细致、周密、严谨,保证了这一基本方法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同样,他们的方法也启示我们,任何调查,离不开调查者的人文关切、社会关切、历史关切、未来关切、学术关切;离不开与国家和民族的惺惺相惜,离不开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尽管历史和研究方法不断地衍变,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实证社会调查的范本表明了“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但应避免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些论断总归是考察生活与社会的重要思想方法。人与社会关系如何设计、数据如何统计、变量关系如何确定、定量与定性关系如何发现真实的切入点等问题,需要正确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建构。无疑,任何一项调查都希望有“新发现”,并以统计结果为依据。但真正需要了解:是哪些和什么样的分析框架、相关因素,以及控制条件才能获得真正的认知。

第三,实证调查的设计,总是以具体的社会变革为背景、为动力、为参数,并为调查目标、路径、指标提出新方法和新依据;调查的目的,不仅是看到今天的状况,也要预见到明天和更远的明天,并给出了理性分析和高屋建瓴的预见。为了使这种预见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社会学在衍变过程中,不仅使用问卷调查,还运用参与观察、社区考察、定性访谈、深度访谈、随机访谈等多种方法,可以完善问卷调查之不足,进而可能作出更深刻的解释。也就是说,缺少观察和亲身体验的“问卷调查”会在提出假设、定出观察计划、组成变项、分析变项关系等起步阶段,就失去准确性。

第四,实证调查的设计,以及数据的统计,是观察社会与生活,描述现状的基本方法。然而,这是不完全的、单薄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他们的实证调查与研究揭示了“为什么是这

个现状”、“如何摆脱这个现状”、并“发现了其中的规律”、“预见未来的方向”。由此看来,实证调查是建构理论学说的经验依据,而仅有依据,没有理论分析之洞见,那得出的结论一定是平庸的、肤浅的。

四、值得反思的问题

纵观实证调查与生活方式的衍变史,印证了马克思的论断:“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也正如费孝通所说:“生活的需要是社会得以运行的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因。”衍变的历史告诉我们,生活与生活的概念从来都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准确地把握与敏锐地捕捉时代变化的信息十分重要,因此,新时代的实证调查的设计与预设应有更高的要求。有几个问题值得反思:

第一,当代的社会调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做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笔者认为,他们当年的实证调查对我们今天掌握和如何运用调查方法仍然是一个楷模,对于组织者、设计者、调查者来说,其姿态、情感、观察、体验、责任等诸多人文情怀和学术情怀的聚合十分重要。

当下,中国是实证调查“广种薄收”的时代,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或机构大多仅将调查作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技术工具,或是学界和组织机构的“形象工程”、“镀金工程”。而粗制滥造、以假充真、伪造数据、缺乏观察、缺少“零距离”的体验等十分普遍,这会影响调查统计分析报告的质量,影响数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影响参与者的独立性和中立性。难怪一些调查统计的结论让人质疑。对此,我们应该深刻反思。

第二,生活方式调查必须能较全面地反映社会变革的背景,对引领未来风尚、趋势的各种因素有足够的关注。事实上,现在各领域的问卷调查(特别是常见的民意测验)常常具有局限性,即为了证明某个命题,要掌握一组个体,要做彼此间背景的比较,但是,又往往只抓住局部的、片面的、表面的,甚至不确切的要件,为定性分析作出误判。离开了具体的、当下的、纵横现象之比较,其结论容易对人产生误

导,难以呈现真实的现状,难以描摹未来的目标和方向。这会使得大投入的调查功亏一篑。

第三,定量调查方法是从一组单元中收集各单元的可对比信息的方法;调查的出发点是“为什么的问题”,为探求“为什么”,我们必须合理地提出假设,定出观察计划,组成变项,分析变项之间的各种关系。但不断有人指出调查问卷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方式所具有的局限性。也有人认为:实证研究不等于经验层次研究,实证研究的方法是多样的,绝不可把实证研究方法简化为问卷调查方法。这虽然只是质疑,但我们从中的确看到了某些浮夸、伪证、虚假的成分。从西方学术界来看,社会学的发展十分迅速,无论是学科自身,还是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都在不断地演进,因为他们深知,社会实验和生活实践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任何试错都是灾难性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仍是公理。因此,周延调查研究方法、积累历史教训、学习先进经验、端正调查态度,回避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弯路,当是中国社会学界的要务。

第四,有学者撰文指出:“问卷调查是不是在发明车轮”?我们所要调查的那些具体现象是不是“大概率现象”?如果是,那么对于描述调查来说,我们只是查明了一些尽人皆知的情况,还不如不调查。”^[17]笔者在多篇论文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一篇论文以看似科学、严谨的论证,却得出一个尽人所知的“结论”,这实在是得不偿失。比如,论证“一个学者从博士到评上教授究竟需要花多少年的时间”,其实,除去极个别人才,大多数人都需要17年左右的时间经历,可以说这是社会共识。而一篇论文以看似科学、严谨的论证,却得出一个尽人所知的“结论”,这实在是得不偿失。毕竟,课题要投入相当的人、财、物和时间成本。

第五,社会学与哲学、经济学、人类学、史学、心理学、行为学、文化学、人口学等学科密切相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知识背景中就囊括了当时最重要的各学科门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为着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导师,同时也是十分博学和严谨的学者。他们研究过的文献种类很多、范围极广,其中包括罗马法史、拉丁语、

刑法典籍、教会法、哲学史、法哲学、艺术学,此外还有文艺作品。马克思曾对他的父亲说:“我已越来越牢固地同现代世界哲学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没有哲学的帮助就不能把任何东西吃透。”^[5](pp.11-12)]可见哲学与其他学科在社会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目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偏重于分析技术过程、偏重于客观描述、偏重于数据统计的过程,而缺乏来自哲学、人类学、心理学、行为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这对学科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实证调查至今已有170年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越来越成熟,方法手段(特别是问卷调查的方法与手段)越来越成熟,而生活和社会也在魔幻般地衍变着,但其中一个要旨没有变,那就是实证调查越来越回归人性与生活,越来越接近马克思对人类未来的理想。

如何定义当代的生活、如何定义“好生活”、如何揭示社会转型中重要特征、如何认识科技发展将对生活产生的影响(正面的、负面的)、如何认识闲暇时间在当今生活方式中的核心地位等等问题是值得思考的。那么,这些问题又将以何种方式进入我们的“问卷调查”等实证调查,如何采撷时代的精华、调查者应有何种使命和责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不当仅仅成为“思考生活、体验思想”的智力活动,而应当成为各种项目在调查统计之后,并

从理论上陈述清楚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的实际行为将“思辨”铺展在“现实生活面前”,并为社会学的实证调查树立了典范。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 [5][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马克思传[M].易廷镇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78.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8]Isaia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5th ed. [M].Thornton Butterworth, 1939.
- [9]马惠娣.社会转型中的生活方式[J].晋阳学刊,2013,(3).
- [10]智效民,陶孟和.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J].学术界,2002,(5).
- [11]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2]李大钊.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J].新生活,1919,(5).
- [1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戴可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4]于光远.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 [15]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EB/OL].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5/65378/4429522.html.
- [16]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0.
- [17]黄盈盈,潘绥铭.社会学问卷调查的边界与限度[J].学术研究,2010,(7).

责任编辑:晓 凌